

浙江最早的各类藏书楼考证

赵美娣

(浙江大学图书馆 杭州 310027)

【摘要】根据我国古代的藏书体系,古代藏书楼可以分为官府藏书楼、私家藏书楼、寺观藏书楼和书院藏书楼四大类型。浙江省素有“文物之邦”的美誉,图书馆事业源远流长,藏书之风更由来已久,这四大类型的藏书楼都有值得骄傲的代表。追根寻源,考证浙江不同类型藏书楼的源头,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关键词】藏书楼;浙江;历史;考证

藏书楼是指收藏图书文献和档案典籍的场所。广义上说,只要有文献出现,就一定有放置文献的场所,也就有了藏书楼。最初的藏书楼并不一定有什么冠名,各朝各代有各种对藏书楼的不同叫法,如阁、堂、轩、馆、亭、台、房、斋、室、舍、洞、屋、居等等。无论叫什么,只要它的主要作用是藏书,都属于藏书楼的范畴。根据我国古代的藏书体系,古代藏书楼可以分为官府藏书楼、私家藏书楼、寺观藏书楼和书院藏书楼四大类型。本文主要考证这四大藏书楼在浙江省的起源。

1 浙江最早的官府藏书楼

官府藏书楼是指由官方兴建,其藏书属于官方拥有的藏书楼。官府藏书一般可分为皇室内府藏书、中央官府藏书和地方官府藏书三种。皇家藏书楼是指设在宫廷内府的藏书处,专供皇帝、皇室成员使用,其藏书称为“内书”。中央官府藏书楼是指设在宫外的朝廷政府藏书处,其藏书称作“外书”。皇室和中央官府藏书具有国家藏书的性质,往往代表或反映某个时代的国家藏书总貌,书楼建筑也考究,设施完善,制度健全,职能兼备。而地方官府的藏书则相形见绌,既没有专设的机构场所,也没有专项的购书经费,藏书处通常附设在府衙郡斋,或州学县庠内,主要供地方官员和官学诸生使用,规模甚小,在古代官府藏书体系中并未能产生太大的影响。

在浙江各类藏书楼中,最早出现的藏书楼无疑是官府藏书楼。其中包括皇室藏书楼、政府机构藏书楼、地方政府藏书楼、官学藏书楼等。作为皇室藏书楼和政府机构藏书楼,浙江古代春秋时期的会稽,为越国称霸前的都城,尽管该时期浙江与北方各诸侯国相比,在文化等方面尚有差距,但作为一个诸侯强国,不可能没有皇室藏书之所和政府机构藏书之所。但由于没有相关记载,我们只能通过推论。因为春秋时期地方官府藏书和官学基本为空白,所以,浙江最早的官府藏书楼应该为越国时期在会稽(今绍兴)存在的皇室藏书之所和政府机构藏书之所。

浙江自秦开始成为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的一部分,各地有郡、县等建制,然后历代多有变化,到唐肃宗时(758年),才作为一个省级行政区基本成形。期间因为政治中心在北方,代表当时官府藏书最主要的皇室藏书、政府机构藏书在浙江皆为空白。而地方官府藏书在当时造纸技术及印刷技术没有普及发展起来的时候,文献量本来就不多,即使有一部分也不会专门建造收藏的楼阁。官学在秦汉以前概称“庠序”,西汉新创“太学”,但也是设立在京师的最高学府,浙江同样没有这类藏书。当然自汉朝后,中国开始了以儒学为正统学问的教育,除太学为国学外,地方官办学校也开始兴起,浙江的各级官学应该也有。如东汉时王充就在上虞书馆读书,当为地方之官学。但此时的学校以老师讲课为主,并无许多官学藏书,故推断浙江的地方官府藏书楼也当在造纸技术基本成熟并雕版印刷开始广泛应用的唐朝以后。

本文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05WZT028)“浙江藏书楼史”的系列成果之一。

对浙江官府藏书最早有记载的为五代吴越国时期的秘阁藏书。其时钱氏历代吴越王都比较重视文教,在佛经印刷等方面多有建树,钱氏王族中也多有比较著名的藏书家被记载。当时的皇室藏书楼也应该有一定规模,但苦于未见相关文字记载。秘阁藏书因为在吴越归宋后有相应记录,“两浙钱归朝,遣使使其书籍送馆阁,用雕木为架,以青线帕幕之,简册之府,翕然一变矣”(《宋会要辑稿·崇文院》),可知其规模不小。

宋朝以后,南宋的各类皇室藏书和官府藏书自不必说,宋以后的地方官府藏书楼和官学藏书楼也为数不少,但这里不再细考。

2 浙江最早的私家藏书楼

私家藏书楼是指民间私人贮存藏书的处所,或斋室,或阁楼。民间私人藏书的历史稍晚于官府藏书,约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学术下移民间,百家争鸣、诸子竞说的较为自由和开放的社会氛围,为早期私人藏书的滋生提供了条件,孔子就是我国最早的藏书家之一。

浙江的私家藏书早在东汉时就有了,不过其时典籍尚少,且记载不详。私人藏书有较详细记载的是三国时吴郡的范平。范平(约215—284年),字子安,吴郡钱唐唐人。好藏书,家中遍备诸子百家著作。陈颐道在《怀范子安》一诗中,有“七录香芸新秘阁,百年黄叶旧江村”之句评其藏书^[1]。范平之孙范蔚继承了家学藏书传统,也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晋书》卷九一《范平传》载:“泉子蔚,关内侯。家世好学,有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蔚为办衣食”。当时有书7000余卷是非常可观的了,范蔚还对外借阅,并为读者办衣食,可说是古代早期将私人藏书公开借阅,并提供无偿服务的罕有事例。此后南朝沈约的私人藏书也十分有名,据说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私人藏书家,《湖州府志》载其藏书有2万卷之多,并称其藏书“京师莫比”^[2]。但这些早期的藏书家并无相应的建造藏书楼的有关记载,也无类似的室号楼名。

浙江最早对藏书楼有记录的当推钱铄在九里松所建书楼。钱铄是吴越王钱氏的后代,据《武林藏书录》载,钱铄“尝建杰阁,藏书甚富”,虽然钱铄的藏书楼没有留下楼名,但当年苏东坡曾为之题写匾额,称“钱氏书藏”。而浙江最早有名可考的私家藏书楼为石待旦的“万卷堂”。新昌县志记载,宋咸平三年(999),石渥、石待旦父子创建石溪义塾于南石溪村并亲自掌教。据《石氏宗谱》所记,石待旦藏书甚多,建藏书楼于塾,名“万卷堂”,旁置议善阁、传心阁等^[3]。虽然“万卷堂”实亦为私塾藏书楼,但这个私塾和藏书楼皆乃个人所建,其中的藏书也是私人所有,所以应该属私家藏书楼。当然,浙江现存的私家藏书楼中,最早也是最为有名的要数明朝著名藏书家范钦所创的“天一阁”了,它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同时是亚洲现存历史最悠久、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三个家族图书馆之一。

3 浙江最早的书院藏书楼

书院藏书楼是书院存放书籍之处,是书院整体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书院建筑布局中,由于它是整个建筑群中少有的阁楼式的建筑,甚至可能是书院唯一较高大的楼阁,为了显示其重要性,藏书楼多建在中轴线上,或在讲堂之后的突出位置。书院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是我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在世界教育发展史上独具特色,对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学术文化的发展,人才的培养,曾起巨大的推进作用。书院的名称始于唐代,根据主办者的不同,有官办与民办两类。唐代最初设立的官办书院有丽正书院和集贤书院,是唐王朝修书、待讲的地方,藏书史上把这些书院所藏图书归入官府藏书,而真正的书院藏书是指后来作为培养人才的教学机构的书院所拥有的藏书。

浙江也是在唐朝时开始兴建书院。唐开元十一年(723),越州(今绍兴)建丽正书院。唐中和元年(881),建诸暨县溪山书院。这些书院兴建之初和当时唐皇朝官办的丽正书院一样,仅供校书、藏书之用,后逐渐成为讲学处所。作为教育机构而兴建的书院,浙江最早的记载有,唐大中四年(850)象山县令杨弘正“筑蓬莱书院以课士,文教大振”,后蓬莱书院先后更名为缙水书院和缙溪书院。唐开元年间曾在集贤院任学士的徐安贞,在返回浙江龙游原籍之后所建的九峰书院。还有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山阴进士陆轾创建的陆太傅书院则是较早的私人创建的书院^[4]。这些书院是读书人居院读书的地方,那就意味着院中必然藏有一定数

量的图书,然因为规模都不大,一般没有专门的藏书楼,而且这样的书院与后来作为讲学之所的书院还有一定的区别。南宋书院已经非常普遍,当时全国有 22 所著名书院,浙江名列其中的有六:金华丽泽书院、宁波甬东书院、绍兴稽山书院、淳安石峡书院、衢州柯山书院和清献书院。作为著名书院,藏书楼应该是必要的设施。根据有关记载,丽泽书院,原名丽泽堂,亦叫丽泽书堂,为南宋著名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吕祖谦讲学会友之所,建于宋乾道初(约 1165-1166),系其曾祖父东莱郡侯吕好问于建炎年间宋室南迁时携全家自开封迁居金华时所借之官屋。甬东书院建于嘉熙元年(1237),为士子郑忠定创建。石硖书院建于南宋淳熙元年(1174),原是南宋淳熙十年状元方逢辰讲学著述的住所。柯山书院初为宋大观间里人毛友、郑可简在烂柯山右梅岩所筑的读书之处,取名梅岩精舍,淳佑六年(1246)知州杨彦瞻立为书院。稽山书院是宝元二年至康定元年(1039~1040)由范仲淹创建,而后来很有名的王守仁所作“稽山书院尊经阁记”所说的尊经阁为嘉靖三年(1524)当地知府南大吉命山阴县令吴瀛扩建稽山书院时所修。清献书院原为北宋名臣赵的故居。咸淳间(1268)知州陈蒙于拱辰门外立为书院,因赵去世后谥号清献,故名^[5]。

从书院创建时间看,以稽山书院最早,但这些书院创建初是否有专门的藏书楼皆未记载。据相关记载,一般书院兴建专门的藏书楼或独立的藏书楼是在元朝和明朝开始流行,其中有些是旧楼重建,辟专门用于藏书之所,另一种则是扩建新增书楼,而此时新建的书院则大多配置了藏书楼。在浙江的书院中,有这类藏书楼记录的是嘉定元年(1208),丽泽书院由吕氏弟子重建,重修丽泽书堂和吕祖谦祀室,共建屋十余楹,其中外门五间,祀室及前轩各三间,前为一堂,上悬“丽泽书院”匾额;后为“遗书阁”,用来庋藏吕祖谦生前之作^[6]。是为专门的藏书楼。另据清全祖望撰《杜洲六先生书院记》:“其时甬上书院多设山长,而以杜洲为最盛,有先圣碑亭,有杏坛,有祀殿,有讲堂,有六斋,中为慈湖祠,旁为六先生祠;有书库,有祭器,门廊庖纤悉毕备,有田租以资学者,盖仿佛四大书院之规制而为之”。可见杜洲书院也有专门藏书楼。经查相关资料,杜洲书院是元至大二年(1309)由邑人童金创建^[7],明显晚于丽泽书院遗书阁。

4 浙江最早的寺观藏书楼

寺观藏书是指由寺院和道观收藏的文献,寺观藏书楼也就是寺院和道观存放这些文献的地方了,一般叫藏经阁、藏经殿、藏经楼比较多。寺院藏经楼属于寺院建筑的一部分,一般建造在寺院的南北中轴线后端,是佛寺的主体建筑之一,多为两层正殿。此种两层佛阁,下层常为“千佛阁”,中设毗卢遮那佛为主尊,沿壁立小龕设千佛乃至万佛(万佛阁),象征众佛结集会诵读经。也有居中设三世佛的。佛阁上层沿壁立柜橱安置藏经,中间设条桌供读经用,这种安排建置称为“壁藏”。也有沿壁建成楼阁式小木结构以贮藏藏经的,称为“天宫藏”。另有一种“转轮藏”,简称“轮藏”。因为经藏浩淼,普通信众毕其一生也难于通读,况且亦有文盲不能读经,就以“转轮藏”来解决这一问题,就是特建一间殿阁,常为两三层高,通贯其中。在地下设一个大转轴,轴上安一个八面(或六面)大龕,龕上每面安抽屉储经,此龕能推着转动,转一圈就等于读了一遍经。安转轮藏的殿阁,称为“转轮藏殿”。

寺院所藏经文增加到一定规模,寺院藏书楼便应运而生。现在一般认为佛经最早是西汉末年由大月氏国所派的使者伊存向汉朝的博士弟子景卢传授的,最早传入中国的这部佛经名叫《浮屠经》。伊存向景卢传授《浮屠经》时采用的是口授的方式,但景卢却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把这部经笔录下来了。此后随传经、取经、译经等活动,佛经越来越多,直至编制“大藏经”。浙江最早关于寺院建设的记录为东汉时期在仙居所建的石头禅院,据《光绪仙居志》记载:“东汉兴平元年(194 年)建,初名石头禅院”^[8]。而浙江最早关于寺院藏书楼的记载是傅翕所创的转轮藏殿。这也是国内最早出现的转轮藏。

傅翕(497-569),字玄风,号善慧,东阳郡乌伤县(今浙江义乌)人。南朝梁代禅宗著名之尊宿,双林寺之始祖,中国维摩禅祖师,与达摩、宝志并称梁代三大士,自称是弥勒应身。关于转轮藏的创始,《释门正统》塔庙志云:“初梁朝善慧大士(傅翕玄风)愍诸世人,虽于此道颇知信向,然于赎命法宝,或有男女生来不识字者,或识字而为他缘逼迫不暇披阅者,大士为是之故,特设方便,创成转轮之藏。令信心者推之一匝,则于诵读一大藏经正等无异”。又据《傅大士集》卷一载:“大士在日,常以经目繁多,人或不能遍阅,乃就山中建大层龕,一柱八面,实以诸经,运行不碍,谓之轮藏。乃立愿曰:‘登吾藏门者,生生世世,不失人身;劝世有菩提心者,至诚竭力,能推轮藏不计转数,是人即与持诵诸经功德无异,随愿获益。’今天下所建轮藏,设大士像,实始于此”。^[9]可见,在浙江双林寺首创的转轮藏阁,在整个佛教史上都是值得骄傲的。转轮藏,又名转经藏、转法轮藏或经轮藏等,实乃用以贮存保护释典佛像的、能够旋转的大书架,也可以说是一种回旋式的大经橱,而用于安放转轮藏的建筑,就称为转轮藏殿、转轮藏阁等,是一般

寺院的重要设施,也是藏经阁的一种特殊形式。然根据相关记载,浙江的寺院远早于此,自兴平年建造的“石头禅院”后,又有吴赤乌年间所建的天台兴教院、资福院;黄岩广化院、广孝院、多福院、演教院、宝轮寺;诸暨大雄寺、上省教寺;嵊县广爱寺;慈溪普济教寺;海盐金粟寺、法喜寺;衢州祥符禅寺等^[10],而转轮藏也是在普通藏经楼的基础上创立的一种形式。所以,浙江最早的寺院藏书楼当早于双林寺的转轮藏阁,但因为没有明确记载什么时候和哪个寺院,故难以考证。

参考文献:

- [1] 任继愈主编. 中国藏书楼[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1.
- [2] 顾志兴. 浙江藏书家藏书楼[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 [3] 走进绍兴:绍兴市志[M/OL]. [2012-03]. <http://www.sx.gov.cn/20050411001982>.
- [4] 朱小燕. 浙江书院藏书考略[J].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 2004, (1):66-70.
- [5] 李国钧主编. 中国书院史[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4.
- [6] 秦玉清, 张 彬. 吕祖谦与丽泽书院[J].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 1999, (2):32-35.
- [7] 浙江在线. 元代, 浙江书院藏书的制度化和正规化建设[EB/OL]. [2012-03].
<http://www.culture.zjol.com.cn/05culture/system/2007/02/23/008191777.shtml>.
- [8] 刘 杭. 浙江寺观藏书述要[J].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 2004, (3):70-74.
- [9] 黄美燕. 经藏与转轮藏的创始及其发展源流辨析[J]. 东方博物, 2006, (2):66-72.
- [10] 陈荣富. 浙江佛教史[M].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1.